

石仲泉 著



当代中国的 邓小平理论

DANGDAI ZHONGGUO DE
DENGXIAOPING LILUN

湖北人民出版社

DANGDAI ZHONGGUO
DE DENGXIAOPING LILUN

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

石仲泉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 / 石仲泉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

ISBN 7-216-02272-6

I. 当…

II. 石…

III. 邓小平-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思想-评论 文集

N.D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28032 号

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

石仲泉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
邮编:430022

印刷:湖北省新华印刷厂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25.375

字数:623 千字

插页:5

版次:1998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 940

定价:39.50 元

书号:ISBN 7-216-02272-6/D·422

前 言

雷阵雨过后，一弯彩虹挂天际。这是自然界最美丽的景观之一。

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暴风雨后，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简称“邓小平理论”），就如同彩虹一样，越来越为中国人民所喜爱。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伟大、壮观，也越来越为中国人民所感受。

但是，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却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拿我个人来说就是如此。我不是“先知先觉”者，没有这个天资。自我反思，大概也不算“后知后觉”者，我这个人似乎也没那么冥顽不化。同许多人一样，我算“中知中觉”吧。不管过去有没有这个说法，这是客观上存在的一种认识状态。

我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研究大约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3年7月《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出版之后。

那时，我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的研究。在邓小平著作出版之后，我没有去直接地展开研究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本身，而是从他的思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的角度进行研究。不仅对邓小平是如此，在1980年12月《周恩来选集》上卷出版之后，在1981年12月《刘少奇选集》上卷出版之后，我也注重从周恩来、刘少奇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这个方面进行研究。在1983年初秋，应《历史唯物主义论丛》之约，我曾写过一篇《邓小平同志是怎样坚

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学习《邓小平文选》札记》，讲了12个问题，长达3.6万多字。这算是我初读《邓选》的最初的研究成果。由于长期以来养成的以认真老实的态度学习原著、细抠原著精神的习惯，这篇札记写得比较扎实，反映不错。后来为了参加全国纪念毛泽东诞辰9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就在这篇札记的基础上写了《邓小平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贡献》一文，在学术讨论会上作了发言。这个发言随后发表在1983年《哲学研究》第12期上。现在看来，这两篇文章的一些认识尽管不够深刻，一些分析也不那么准确，或许还有个别的不当，但作为研究邓小平思想理论第一阶段，亦即初级阶段的成果，我还是将《邓小平对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贡献》收入在本书中了。

第二阶段，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传达和发表以后。

在1983年下半年写了几篇文章以后，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就放下了。一是我当时所在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已成立了一个邓小平生平及著作研究组，这是研究邓小平的专业队伍，有了这支专业队，我用不着去掺和。二是我当时负责中央文献研究室理论研究组的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研究建国以后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是本职工作，主要精力要集中于此。因此，有8年时间没有研究邓小平了。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的传达，犹如中华大地响起一声春雷。它对人们思想的震撼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在北京的理论圈内，没有生活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是很难体会到这个“震撼力”的。尽管如此，最初也没有要再度研究邓小平理论，并进行写作的冲动。思想的变化，反映在1992年11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这本小册子中。我在这本书后记中曾经写道：“1992年初夏，出差南方，了解到对于学习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的一些反映，感到

震动，触发了要写一点东西来辨析一些问题的念头。本来，对于现实问题的研究，近些时我无暇多顾，但一种责任感驱使着我“不吐不快”，犹如骨鲠在喉。在湖南湘潭，由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举办的学术讲座上讲了当时形成的一些思想观点。回到北京后，一鼓作气，初步形成了这篇文字的大体框架。后来，应一些讲习班、研讨班之邀又讲过多次。每次讲完后，都在听讲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有的刊物摘发或内部刊发过。中国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研究会会刊《毛泽东思想理论与实践》曾向读者推荐。”这是讲的1992年7月写的收在本书中《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一文的背景。由于十四大之后，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和中宣部的通知，学习十四大文件要同学习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结合起来，人民出版社领导决定将我写的这篇文章又以小册子形式单独出版。为了宣传十四大，受当时我所在的中央文献研究室领导之托，在时间异常紧迫的情况下，不得不以“短促突击”的方式为人民出版社的《十四大报告辅导读本》写了3篇文章。这样就形成了我研究邓小平理论的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的研究以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主要对象。这一阶段的一些论文，主要是围绕“南方谈话”和十四大精神写的。这些论文在内容上有两大重点。一是针对当时对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和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出现的这样那样的一些看法，在前一阶段研究的基础上着重对这个问题展开了新一轮的较深层次的研究；二是针对“南方谈话”发表后在理论界和社会上出现的一些疑虑、困惑，着重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辨析。通过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理论问题的较为深入的研究，从而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认识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准。写了1992年7月那篇文章之后，感到言犹未尽，1993年11月又写了《当代中国历史航船的伟大指针》一文，进一步回答了

一些热点问题。这两篇文章可谓是我研究“南方谈话”的代表作，也是反映这一阶段我对邓小平理论的认识和研究水平的主要论文。

第三阶段，在1993年底《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前后。

为了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要写文章参加全国的学术讨论会，我以前两个阶段的研究为基础，继续从宏观上和总体上对邓小平与毛泽东的关系和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作了研究，写了收在本书中的题为《再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兼论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追求、探索和贡献》一文。

《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后，我作为理论工作者参加了在中共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3卷的第2期研讨班，集中读了一个月的书，对构成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著作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作为参加这期读书班的研究成果，我写了《建构社会主义新理论，开创社会主义新世纪》一文（这也算是结业论文）。

这个时候，上海辞书出版社约龚育之同志写《邓小平思想理论大辞典》的领头条目。由于在此之前，该出版社约龚育之同志写《毛泽东思想大辞典》的领头条目时，我曾参与合作，一起写了《毛泽东思想新论大纲》（同时作为单行本出版）。这次龚育之同志又让我参与工作。这样便开始了对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从而也进入了研究邓小平的第三阶段。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劳作，我们完成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领头条目，同时出版了单行本《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新论大纲》。

龚育之同志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期间，我就一直在他领导下工作。在与龚育之同志近20年的接触和工作中，我受到了不少的教益（我从我工作过的单位的其他领导和普通的同志身上也获得过不少教益）。这不仅表现在直接的研究专题上，还表现在一般

研究的分析思路、写作方法、词句表述，以及知识经验、学风人品等上。我对邓小平理论研究所取得的进步，与龚育之同志的帮助有直接关系。

在这一阶段，写了收在本书第三编的多篇论文。这一阶段比较全面研究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总结，即是《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篇长文。这也是我参加全国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的入选论文。

第四阶段，主要在1995年我调到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之后。

由于参与负责编写中共党史的任务很重，我本想不再继续进行邓小平理论的研究了，将业余研究全部转向党史领域。但是由于多方面原因，未能完全割断这个研究情结，还是对若干专题作了研究。有的了却了此前一直未能展开研究的夙愿；有的将过去的研究深化了；更多的是结合中共党史开拓了研究邓小平理论的新的层面。《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邓小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党的八大与党领导的二十世纪中国的两次伟大革命》和《邓小平论中国社会主义前期的党史》等论文，代表了这个时期我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状况，也反映了这一阶段我研究的兴奋点。

我对邓小平理论的研究虽然分为四个阶段，但从上述介绍不难看出，主要集中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来的近几年内。收在本书中的30多篇文章，是10多年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主要成果。研究邓小平理论过程中提出的一些观点，在书中的有关文章中已有所阐释，有的观点还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论述了，不再赘述。这里着重讲讲下面三个观点：

一是关于邓小平理论、毛泽东思想和周恩来精神“三位一体”的观点。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人长期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由于经过“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同许多人

一样，对周恩来怀有一种特殊的崇敬感情。在80年代前期，我曾经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生平和著作研究组工作过两年，对周恩来也进行了一些研究。在1990年初出版《毛泽东的艰辛开拓》之后，1993年10月出版的《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也算是对周恩来研究的结晶吧。因此，我最初是对毛泽东与周恩来进行比较研究，认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这两位伟人，是新中国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尽管毛泽东在创立新中国的历史斗争中功勋更大，但是，新中国能够度过“文化大革命”而没有垮掉，周恩来苦撑危局和维系全党，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说30年代中共党内长达4年的“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曾使中国革命濒临绝境，是毛泽东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的话，那么，时间更长的“文化大革命”使一个好端端的中国重新陷入大混乱、大动荡、大浩劫之中，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和、抗争和维系作用，才使这个新生的国家免遭完全、彻底的崩溃。这个功绩同毛泽东的功绩一样，也是中国人民永志不忘的。

对毛泽东、周恩来除了作历史功绩的比较外，还对他们在精神领域作出的贡献作了比较。在《周恩来的卓越奉献》一书的前言中，我提出了“周恩来精神”作为与“毛泽东思想”的对应概念。当时是这样讲的：在经过对毛泽东、周恩来的长时间研究后，“我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看法：在我们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各位老一辈革命家都对中国的革命作出了伟大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都以各自的特色对后世发挥影响。其间，就毛泽东与周恩来相比较而言，最有影响的可能是‘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这么讲，既丝毫不意味着要贬损其他老一辈革命家的作用，也不是说周恩来没‘思想’，毛泽东没‘精神’。”为了不致于引起歧义，衍生出其他枝节来，我还讲了一段话，说任何比较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都只是就某个方面突出某个特点的比较。我比较毛泽东和周恩来，是因为他俩在这一代老革命家中，共

事时间和对党的历史发生影响的时间都很长。他们对后世的影响当然是全方位和多方面的，“但相对来说，毛泽东的思想理论的影响比其精神风范的影响更为突出，周恩来的精神风范的影响比其思想理论的影响更为强烈。因此，姑且以‘毛泽东的思想，周恩来的精神’来表明他们对后世影响侧重的力度。”^①在那本书里，我将“周恩来精神”概括为八个方面：无我、求是、创新、民主、廉洁、严细、守纪、牺牲。它的核心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精神，其他都是由此派生或为此要求而俱生的。只有这样认识，才能把握“周恩来精神”的真谛。这个比较得到了不少研究者和读者的认同。

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重点转向对毛泽东与邓小平作比较研究。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反映了我的比较研究的思路（主要是考察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外，还有收在本书中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现代中国的两位历史伟人》和未收入本书的《开创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双星——毛泽东和邓小平》（载于《党建》1993年第12期）等文。在这两篇文章中，对毛、邓的比较研究，着重于他们的历史地位。我是放眼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来考察的。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尽管经历了许多重大的革命和战争，发生了无数的改朝和换代，但从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宏观视野来看，就社会形态的变化而言，实际上只经历了两次根本性质的转变，一次是由无阶级的原始公有社会到有阶级的私有剥削社会的转变，再一次是经过漫长的阶级社会之后，在我们国家从20世纪中叶起，又经历了由有阶级的剥削社会到最终要消灭阶级的公有社会的转变。实现这后一次伟大转变的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它的目标是要在世界东方这块繁衍中华民族的辽阔大地上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

① 《周恩来的卓越奉献》前言第5页。

义国家，为此，中国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既进行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也进行了含辛茹苦的艰难探索。如果把毛泽东、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成熟的两代领导集体的杰出代表来看，那么就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言，则如人们的共识所认为的那样，是始于毛泽东，成于邓小平。放在这样的历史长河中作比较研究，有助于正确地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

在分别对毛泽东与周恩来、毛泽东与邓小平作比较研究后，1993年春，我开始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三位伟人作综合性的比较研究。这三位伟人堪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杰”。就他们的历史作用而言，如果用简单一句话来概括，相对地讲，毛泽东主要表现为创建新中国，周恩来主要表现为维系新中国，邓小平主要表现为发展新中国。就他们留下的精神财富而言，则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精神，邓小平理论。为什么要强调这三者？在1996年4月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周恩来研究述评学术讨论会的闭幕式上，我讲过我的观点。现转述如下：“在1993年南京纪念周恩来诞辰95周年学术讨论会上，我曾经提出‘三合一’的观点，或者说‘三位一体’的观点。即是说，要使我们国家在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第一要坚持毛泽东创立的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思想，第二要坚持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制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第三还要坚持周恩来那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这三者缺一不可。只有前两条，没有后一条，那个宏伟目标是很难实现的。因此，加强‘周恩来精神’的研究，大力宣传和弘扬‘周恩来精神’，是关系到用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来兴国、富国、强国，使社会主义长治久安的一个重要内容。”^①

^① 《周恩来研究述评》第25页。

那是研究周恩来的会，很自然地要强调这“三位一体”中的“周恩来精神”。现在要讲邓小平，无疑应当转换视角，强调“邓小平理论”这一方面。这在本书的文章里讲了不少。江泽民总书记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的讲话，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他说，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至今仍然存在一个学风问题。一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就会走到邪路上去。另一方面，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孤立地静止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统一的科学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这里，实际上讲了“三位一体”中的两个方面对于兴国、富国、强国，使社会主义长治久安具有的重要意义。我完全同意江总书记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二是关于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相对应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概念。在《邓小平文选》第3卷出版以后，在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过程中，经常听到对这个理论的这样那样一些说法，有的话还异常尖锐。这里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些消极的腐败的丑恶的现象如何认识的问题。或者说，现实同理论之间存在的某种反差影响了对理论的认同。不少人存在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现实生活中的一切消极、腐败、丑恶现象都是改革开放带来的，都归罪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是对理论的莫大误解。这里的认识误区在于，把现实社会现象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划等号，以为所看到的一切实践和社会现象都是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这是一种糊涂观念，需要辨析。怎么辨析？从理论上来说，方法之一，就是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这个概念。它的内涵是，符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这就是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现实社会现象是两个概念，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应当混淆。那些在根本上违背和偏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实践，都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来看，不存在反差；目前人们所看到的反差，即那些消极的、腐败的、丑恶的社会现象，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格格不入，完全是偏离、违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求的，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全面地正确地贯彻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正是要消除那些消极的、腐败的、丑恶的社会现象。因此，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本身不好，而是实践偏离和违背了理论的要求；不应当怀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应当使更多的实践成为真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这里有一个如何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转化成为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能完全转化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使理论与现实之间发生巨大反差，出现许多令人堪忧的消极的、腐败的、丑恶的社会现象，这有许多原因，情况很复杂，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需要作认真的具体分析。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凡是消极、腐败、丑恶现象比较突出的地方和部门，都与那里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的素质有密切关系。他们的政治素质、理论素质、思想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历史知识素质以及行政管理素质等，在某些方面至少是不合格。其中，凡有消极、腐败、丑恶行为的干部，无一不与他们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变异有密

切关系。一个地方或部门，有这样的干部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那里就很难不发生扭曲和变形，那里的实践就不是真正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因此，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概念，不仅有助于将现实社会现象和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加以区别，而且对于全面地、真正地贯彻和落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要求也是有意义的。我以为，这是深化研究当代中国的邓小平理论应当引为注意的一个问题。

三是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三面镜子和两个“周期率(律)”现象。

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执政党建设问题是近些年来的一个社会热点，也是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随着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深入，我也对这个问题愈益关注起来。在对邓小平理论各个内容的专题研究中，对这个专题发表的文章相对地也多一些。在1996年初，开始提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建设的三面镜子和两个“周期率(律)”现象。

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考，并不是在1949年执政之后，而是始自执政之前。执政之后更是从未间断、从未忽视过这个问题。所谓三面镜子，实际上也反映了对这个问题思考的三个阶段。

作为中国共产党关于执政党建设的第一面镜子是李自成农民军。抗战后期，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毛泽东引为史鉴，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告诫全党要吸取李自成农民军进北京后腐化蜕变、顷刻覆灭的教训。这支农民军“打江山十八年，坐江山十八天”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在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从西柏坡进北京时还在念叨这面历史的镜子，表示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我们决不当李自成，不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希望考个好成绩。此后，中国共产党长期以这面镜子教育自己

的干部。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面镜子就是蒋介石国民党。国民党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很坏的，成立之初也是革命党。在抗日战争中也曾抵抗过日本侵略军。抗战胜利后，蒋介石的威望一度如日中天。什么“民族英雄”、“革命领袖”，也曾被喊得震天价响。但是没过几天，“接收大员满天飞，五子登科遍地是”，蒋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仅过四年，拥有800万军队的国民党政府彻底垮台了。这是腐败导致灭亡的又一面镜子。1948年12月，刘少奇谈到这个历史教训说：历史上从来有这个问题，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们党注意到这一方面，加强思想教育，提高纪律性，就会好一些。”他还进一步指出：“我们打倒蒋介石、打倒旧政权后，要领导全国人民组织国家，如果搞得不好，别人也能推翻我们的。”^①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进城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要切记“两个务必”：“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实际上也包含有对国民党这面历史镜子反思后得出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的第三面镜子就是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1898年成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比中国共产党大23岁。这个党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成为执政党，随后在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广阔土地上建立起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5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后，由于苏联红军的解放作用，许多东欧国家也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革命胜利后到50年代前期，已

① 《刘少奇选集》上卷第413页。

形成了一个能与资本主义世界相抗衡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这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鼎盛时期。从50年代后期开始，一方面由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利益，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分歧，中国共产党拒绝了苏联共产党的“指挥棒”。到60年代前期，世界上这两个最大的共产党和与此相应的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公开的对抗。至60年代末，对抗发展成为军事冲突。中国共产党研究了苏联共产党自苏共20大以后的路线和政策，认为这个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这个党领导的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于是，又把它作为一面镜子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党建设。后来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从党的建设这个角度说，就是从苏联的教训中获得警戒，“反修防修”，使党不变质，国不变色。当然，“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并使我们国家经历了一场大灾难。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但是，历史往往爱捉弄人。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对苏联的认识结论，在60年代、70年代还不那么符合苏联的实际的话，那么到90年代，却像预言似的被不幸而言中了。1991年“八月事件”以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74个春秋之后解体了；曾经为世界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103年的统一的共产党组织分崩离析了。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是加强执政党建设更具有现实意义的一面镜子。

这三面镜子，按其作为镜子的事件本身发生的时间来说，一个是在近350年前，一个是在近50年前，一个是在5年前：就这几个事件的性质来看，一个是农民起义军的自掘坟墓，一个是中国大资产阶级政党在亚洲东方大陆的覆灭，一个是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世界上最早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垮台。这不能不始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教材。

“周期率（律）”问题，是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访问延安时，在与毛泽东的谈话中提出的。黄说，他一生耳闻目睹的不算少，小至家庭，大至国家，能跳出“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的支配力”的不多。因此，他问毛泽东：“共产党能否找到一条新路，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就是“周期率”问题的提出。这里的“率”应为“律”之误。黄的秘书后来回忆此事作了更正。我们现在把它通用。其实，应当改过来，故我一般采用“周期率（律）”的写法。

这就是一个过执政关的问题。原来以为这是一个短时期内存在的问题。建了国，政权巩固了，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现在看来，这是一个长时期都存在的问题。只要想巩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就始终有一个过执政关的问题。建国之初，过执政关主要担心“糖衣炮弹”的攻击。那时，确有“糖弹”，但只打倒了像刘青山、张子善、高岗、饶漱石这样的个别人。绝大多数干部都顺利地过了这一关，没有当“李自成”。反思历史，就过执政关而言，更重要的恐怕不是“糖衣炮弹”的攻击，而是权力腐蚀，这对共产党的威胁和危害更大。邓小平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¹现在，从基层干部到高级领导干部，凡是蜕化变质的，都与权力腐蚀有关系。这些人掌握权力以后忘乎所以，忘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两个务必”的要求抛到九霄云外，挂着共产党人的招牌，干的完全是非共产党的勾当，没有丝毫的共产党人的气味。这些人没有能过执政关，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律）”现象。这是产生社会消极腐败丑恶现象的根源之一。

所谓两个“周期率（律）”现象，就是除了能否经受执政的考验（即掌握权力后会不会改变颜色）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富裕了，还能不能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信奉社会主义的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80页。